

李传松 许宝发 著

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

A History of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李传松 许宝发 著

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

A History of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李传松,许宝发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ISBN 7-5446-0219-2

I. 中... II. ①李... ②许... III. 外语教
学—教育史—中国 IV. H0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6975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张以文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625 字数 428千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7-5446-0219-2 / H · 0091

定 价: 29.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引言

秦汉以来,我国同外国的交往一直很密切。可见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存在的。外语教育势必也在二千年前已开始。但遗憾的是尚未发现有关当时外语教育情况的史料。根据现已发现的史料,最早的外国语文学校算是元朝的“回回国子学”。

元朝(1280~1368年)是我国以蒙古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封建王朝。元朝政府将其统治下的人民分成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包括回回、哈剌鲁、钦察、斡罗思);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四等是南人(也就是南宋遗民)。元代将中央学校分为三类:一为“国子学”,主要教授儒家学说,创立于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69年)。二为“蒙古国子学”,创立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1271年)。规定蒙古学生70人,色目学生20人,汉族学生60人,共为150人。以学习蒙文为主,兼学算学。学成考核,精通者量授官职。三为“回回国子学”,创立于元世祖到元二十六年(1289年),学生人数定为50人。限公卿大夫及富民子弟入学。所学的不是蒙古文,而是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以培养官衙译史人才为目的。学科授以回回文文字为主,专以培养诸官衙译史人才为目的。“亦思替非为波斯古代都城之名,亦思替非文字者,波斯文字也。回回国子学者,教习波斯文字者也。元时所谓回回文字,实波斯文字。”(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代以后,明代教习外语的学校主要是“四夷馆”。据《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载:“自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外国

朝贡,特设蒙古、女直(女真——笔者注,下同)、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唱(维吾尔)、缅甸八馆,置译学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但此时八馆是以翻译语言文字为主,因而还不是真正的外语学校,而是翻译机构,如翻译局。直到明代宣德元年(1426年)才“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课程”。明代永乐年间,由于郑和、侯显相继出洋、出访,中国与外交往日益增多,外语教学受到重视。清初改名为四译馆,乾隆十三年(1748年)合并八馆为西域、百夷二馆。

明代之后,清政府开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关于俄罗斯文馆的建立和发展有许多种说法,其中记载较详而又可信的是康熙四十七年三月,设立的《俄罗斯学之上谕奏事档》。1689年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时,曾出现过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国人张诚担任翻译,这两人暗地里和俄国使团戈洛文“里通外国”,受贿徇私,出卖机密,损及中国的根本利益。这只是一例,清政府从17至18世纪初主要用西欧各国传教士和在中国的俄国商人、学生、战俘担任中俄之间翻译工作,这种有损中国利益的事不断发生。康熙考虑到中俄交往之事日增,应培养自己的俄语翻译,可防止外国人从中捣鬼。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三月初八日,在南苑召见大学士马齐,令其“询问蒙古旗内有愿习俄罗斯文者,具奏”。十二日,马齐回奏已得7人,康熙认为“甚少”,令马齐“再于八旗蒙古、汉军内”征集。至二十一日,征得“愿习俄罗斯文语之监生、闲散子弟等六十八名”。当日,马齐即赴畅春园面奏。康熙下旨:“均令习之”,并命马齐立即着手选择教师和校址,确定管理体制。经中俄双方协商,俄方派俄商人瓦西里担任教习,并选定在俄国商团所在地俄罗斯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驻地——北京东直门以北胡家圈胡同)内于康熙提出要办俄罗斯学馆后的第十六天就正式开学。但开学不足两个月,由于俄国商团离京回国,教师瓦西里辞职,马齐上奏,建议从镶黄旗满洲俄罗斯佐领中遴选“善于俄文者,派为教授”,康熙准奏。选定俄罗斯佐领库兹马和伊凡

两人任教,校址拟迁往左翼马市西北大佛寺内,从此以后,这所俄语学校走上正规。但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二十八日,库兹马、伊凡以及后来任教的雅科夫等3人主动提出,他们都是生长在中国的,俄语水平不高,教了3年之后深感难以继续执教。上谕可于盛京(即现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在投降中国的俄罗斯军人中招聘。俄罗斯人尼堪经考核后录用。经近3年的学习,清廷举行考试,在68名学生中只留下27人继续学习。此后,俄罗斯文馆的学员基本上保在25至27名学员,另有少数候补学员,在正式学员升迁或病故等情况,即于递补。从康熙五十年五月初一日起,为使师生安心教学,清政府按月每人给钱两千。清廷为免除“俄文学生无一正途,不肯勤学”的后顾之忧,决定“每人授给一职”,即俄文学员在校学习期间即特授一官职。俄罗斯文馆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由原属内阁典籍厅升级改属内阁管辖,更名为“内阁俄罗斯文馆”,并移址到“东华门外北大街俗名北池子”。

另一资料记载,俄罗斯文馆是培养清政府同俄罗斯政府办理外交和商务官员的学校,并非单纯培养翻译。每五年进行一次考试,按成绩分成三等:一等授七品官,复试仍一等者授以主事的实职;二者授九品官;三者留馆继续学习。正因为考试和升迁结合,因而这种考试的要求比较严格。俄罗斯文馆到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请,开始增设别的外语,从开办起历时154年,最后并入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的创建开始了我国外语教育全新的时代。

从京师同文馆成立(1862年)至今的14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外语教育出现6次高潮,每次都处于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都起了推进历史的重大作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第一次高潮从1862年至19世纪末。在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之后,1863年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设立了广州广方言馆,1893年在武昌设立自强学堂。这4所外语学府设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昌4座中心城市,形成一种甚

具气势的外语教育格局。同时办起了一批军事学校和科技学校如福建船政学堂(1866年)、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机器学堂(1867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上海电报学堂(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年)等。这类学堂大多聘请外籍人员用外语授课,学生入学后均需先学外语;在正式上课时,外语也是重要的课目。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由于当时的洋务运动的需要。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清政府惨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光绪、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等掀起维新运动,维新首先从教育入手,主张废科举,办学堂,按清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所颁布的“壬寅”、“癸卯”学制中,中学堂以上均开设外语课,因而我国大中学普遍开设外语课应以1903年为起点。当时正处于清廷濒临崩溃的转折时期。在这个高潮中产生了严复、颜惠庆、顾维钧、邓世昌等一批历史人物。

第二次高潮在1919年前后。这次高潮的形成和出国留学有密切的关系。1911年清华学堂的成立是个重要的标志,清华的方针是“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扞格”。根据这一方针在校内英语取代了汉语,除几门国学课程(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其余课程全用英语讲授。清华学堂成立之前,相当多的教会大学已经是“根在国外、权在教会、西人为主、外国方式”。我国一批学术界的巨子都从此而出,如竺可桢、茅以升、严济慈、胡适、赵元任、林语堂等。不仅如此,由于赴欧勤工俭学运动开展,各种外语(尤其是法语)短期培训在全国大中城市如雨后春笋。俄语学习也由于1920年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成立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时留学热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国青年通过留学到世界各国去寻求救国图强、报效祖国的方法和途径。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朱德等都是在这一高潮中接触外语,出国留学的。

第三次高潮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中国往何

处去成为必须抉择的问题,外语学习又一个高潮便由此掀起。国民党统治区的英语教学和解放区的俄语教学都备受重视,都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措施。1948年,全国大陆即将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将告结束。1948年3月5日在南京中央大学校友会礼堂举行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由范存忠、沈同治、陆殿扬、张士一、初大告、柳无忌、朱光潜、钱歌川、吕叔湘、陈福田、任泰、袁家骅等21人为理事,潘家洵、谢文炳、温源宁等9人为候补理事的理事会;由杨宪益、曹未风等7人为监事,沈开骥等3人为候补监事的监事会。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还公布了一份《初、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1948年6月中共中央也决定在解放区成立外事学校,由中央外事组领导。在东北,1946年6月,延安外国语学校经中共北满分支书记陈云等同志讨论决定在哈尔滨复校,定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由总部参谋长刘亚楼任校长。

第四次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俄语热”。这是俄语一枝独秀的学习外语的高潮,是由当时“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政策所决定的,当时中苏关系的实际发展也确有需要。这第四次学习外语(主要是俄语)的高潮是在宽广和厚实的思想基础上开展的,这个思想基础就是对党和新中国的拥护和热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憧憬。当时流行着一句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学习了俄语就可以直接接触苏联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把学习俄语作为一种要求进步,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因而不仅青少年学生,包括许多学有所成的专家、教授如马寅初、朱光潜等也不例外。这种精神也表现在英语学子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上: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后,北京、上海外国语学校的英语学生踊跃报名参军,英文部的男生几乎全部获准赴朝,参加对美军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周珏良等教授也赴朝参加这一伟大的斗争。1951年1月华东上海、江苏、山东、安徽、福建等地参加抗美援朝军事二部学校英文学员达500人,分配到北京外

国语学校学习英语、法语、德语,按调干待遇,其中不少人后又陆续被派出国学习。这批学生中不少人成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外语教育事业的骨干,成为驻外使节和著名外语专家、学者。

第五次高潮出现在1964年,具体标志是《外语教育七年计划纲要》的制定。三年困难时期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好转,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活动日益增多,急需大力抓好外语干部培养。由党中央、国务院来制定外语教育的发展计划,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遗憾的是这个计划仅仅实施了两年,就被十年浩劫所中止,我国外语教育事业不仅没有得到应有发展,而且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摧毁。

否极泰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全新的时代,也给中国的外语教育带来全面、持续发展的新高潮。以前的高潮往往更多地和外交直接相关。这次的高潮远远地超出了外交领域,而是为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扫除语言上的障碍。在所有领域中,铺设中外交往的语言通道,外语教育则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倡议者张翼若所说的“外语教育就是中外友好交往、合作的桥梁工程”。

中国外语教育长期以来备受各方面的重视和关怀,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事无大小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指导。中国外语教育也凝聚着几代各方面人士的关注。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先驱邹韬奋亲自参加过外语教学,在推广直接教学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中国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写下一本《中国学英文》,出版于解放前,1962年再版改名为《中国人学英语》,是本难得的、指导英文学习的好书。

从1862年开办京师同文馆以来,中国外语教育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英才,有的是载入史册的历史人物。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等都是1920年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革命先烈瞿秋白、王一飞、赵世炎都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外语专业毕业成为我国外交家,从颜惠庆、顾

维钧到现任的唐家璇、李肇星等，还有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朱光潜、钱钟书、季羨林；翻译家、作家曹靖华、冯至、傅雷；外语教育家张锡铸、王季愚、王佐良等；戏剧家洪深、曹禺；名导演焦菊隐、名演员英若诚、名记者萧乾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培养的大批俄语人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中作出卓有成果的翻译工作之后，许多人又成为他所翻译的专业的专家，如从事工程翻译的成为总工程师、总设计师，从事医学翻译的成为主任医师。1955年西南俄专毕业的吴宗燠历经坎坷，完成了《新美学论纲》，“做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大胆尝试”。现有的外语院校为我国培养外语人才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就以1964年根据《外语教育七年计划》当年招生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为例，从1964年成立至2004年的40年中，除统考以外，还为各行业和西部边远地区培养一定数量的委培生、定向生。从1964年到1993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共有21个专业，共招本科生22届7402人。为国家培养的外语人才中有外事干部刘洪才（中共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王毅（驻日大使）、吴思科（驻埃及大使、驻阿拉伯联盟大使）等大使、参赞、武官等数十人，从事商务工作高虎城（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商务部部长助理）等数十人，从事金融工作的和广北（香港中国银行总裁）、常振明（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边文龙（法国工商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从事旅游事业的有盖志新（中国国旅总社总经理）、宫万春（中国旅行社总经理）、李惠阳（途易首席运营官）等数百人；从事传媒工作有赵立凡（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吕行（美国芝加哥迪堡大学传媒系终身教授）等；至于从事外语教育的从省级优秀外语中学教师到外语院校的领导和博士生导师，则是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少数特殊人才如获2000年电影金鸡奖的导演胡安。从个别可见一斑，其他院校和整个外语教育界也就想见可知了。

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4月14日在海南大学的讲话中指出：“要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就必须懂外文。一个人要掌握一门外语，不容易。像我们那时学外语，每天早上5

点就起来学,一天要记住六七个单词。总之,学什么都要花大力气,没有天生不花力气就取得知识和成果的人。”

这段话里,说明外语是为了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文化,所以外语教育就不能局限于外语专业,外语教育直接影响各门学科,不论文、理、农、工、医、政、法、财、经、管等都有关系,掌握一门或几门外语既是专业,又是工具,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科学文化的工具,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工具,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国的外语教育走过了卓有成就的道路,这是不容低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中国的外语教育是世界第一流的。中国外语教育走过的道路为外语教育的发展提出了经验、动力、启示和条件。

李传松 许宝发

2006年6月



1964年10月22日在高教部部长杨秀峰陪同下，外交部部长陈毅参加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开学典礼，在会上作了关于外语院校办学方针的讲话。



1966年7月2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视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989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视察。

1988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来上海外国语学院就形势和任务，以及学校的办学情况与师生代表进行广泛座谈。随同江泽民来校的有市人大常委会、市委副书记、教卫党委书记陈铁迪、市委常委、秘书长王力平等领导同志。座谈会由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孟浩主持。



199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教育部长陈至立、上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匡迪、市委副书记龚学平等陪同下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学校的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进行考察和指导。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开端

第一节	京师同文馆的筹建	1
第二节	同文馆沿革和管理体制	4
第三节	同文馆和外国人士	8
第四节	同文馆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15
第五节	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	21
第六节	“壬寅”、“癸卯”学制的外语课设置	27

第二章 出国留学和外语教育

第一节	晚清的幼童留学	31
第二节	留学日本	34
第三节	留学美国和清华	40
第四节	赴欧洲留学	44
第五节	赴苏联留学	46
第六节	1927 年以后的留学教育	48
第七节	相辅相成的互动作用	51

第三章 外国人在华办学和外语教育

第一节	近代中国“教会学校”的来龙去脉概述	57
第二节	“中华教育会”的台前幕后	59
第三节	教会学校和外语教育(教学)	64
第四节	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78
第五节	反对奴化教育的斗争	82

第四章 中国外语教育的新路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上海外国语学社	88
-----	------------------------	----

第二节	上海大学	95
第三节	延安的外语教育	99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外语教育	110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高等外语专业教育

第一节	国立北京大学	128
第二节	清华大学	136
第三节	中央大学	147
第四节	南开大学	151
第五节	西南联合大学	154
第六节	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	174
第七节	建国前夕高校外语院系	179

第六章 我国外语教育的除旧立新和改革调整时期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俄语教育	184
第二节	院系调整前后的高等外语教育	191
第三节	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200
第四节	建国初期的业余外语教育	201
第五节	“向科学进军”和外语教育	204
第六节	教育大革命和文科教材会议	211
第七节	红专关系和外语教学	218

第七章 为外语教育打开新局面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

第一节	《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的产生	229
第二节	上下一心,当年招生的奇迹	234
第三节	难忘深刻的办学真理	236
第四节	高等外语院系教学工作会议	242
第五节	《外语教育七年规划》和外国语学校	246
第六节	《外语教育七年规划》和外语师资队伍建设	248
第七节	《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的历史回顾	250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和外语教育

第一节	周总理五次亲临二外	261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	262
第三节	为国家储备外语人才	266
第四节	周总理召开外语教学座谈会	268
第五节	新形势下外语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271
第六节	全国词典编写会议和《词典出版十年规划》	277
第七节	“马振扶事件”的前前后后	282

第九章 中国外语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时期

第一节	外语教育座谈会的召开	291
第二节	教育部颁布教学计划(试行草案)	300
第三节	外语教育的学术机构	320
第四节	多语种发展和世界语恢复	359
第五节	高校外语师资培训工作	362
第六节	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办学模式	369
第七节	外语专业的研究生教育	374
第八节	公共外语发展和提高	386
第九节	科学研究工作	391
第十节	外语教材建设	406
第十一节	外语电教工作	414
第十二节	加强中学外语教育	417

第十章 面向 21 世纪

第一节	全国外语教育(教学)调查工作	431
第二节	外语测试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447
第三节	《关于外语专业面向 21 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 若干意见》	460
第四节	全国外语院校协作组 2002 年年会	472
第五节	高校外语专业提高教育质量的新举措	485
第六节	外语院校的素质教育	498

第七节	学术交流和协作	499
第八节	外语教育社会化	503
第九节	对外汉语教学的新时期	510

编 后